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汉藏语言演化的 历史音变模型

On Evolutionary Models of Sound Changes
for Sino-Tibetan Languages

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
方法探索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一江荻／著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汉藏语言演化的 历史音变模型

On Evolutionary Models of Sound Changes
for Sino-Tibetan Languages

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江 荻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

——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

著 者 / 江 荻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负责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范明礼

责任校对 / 刘芙蓉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金若龙文化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35.25

字 数 / 546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393 - 5/K · 044

定 价 / 7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 / 江荻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80230 - 393 - 5

I. 汉... II. 江... III. 汉藏语系 - 语言演变 - 语言模型 - 研究 IV. H4 -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9381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为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我们将历届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的部分获奖著作重印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向建院三十周年献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序言一

这是一本专门讨论历史语言学理论的书，在国内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还不盛行的时候，居然出现这样一本“另类”的书，令我喜出望外，当然有幸为这本书写序更是我乐意做的事。19世纪历史语言学在欧洲有辉煌的成绩，主要的成绩都是来自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建立亲属语言间的对当关系，根据这种关系构拟原始古语。当然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是基于历史语言学所有的共同信念：“相信语音变化没有例外，如有例外一定可以解释。”这里所说的比较研究以及根据比较研究发现的规律都是以印欧语为对象的，后来以这种框架建立的历史语言学是否能适应每一种语言，自然是讨论的一个问题。

江荻在这本书里提出以汉藏语演变的历史作为观察音变模型的对象。他特别着重语言演变的过程，“任何研究都不能忽略事物的状态和存在”，但是“重过程而非状态，重演化而非存在应该成为语言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他提出“语言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在不同社会时期它处于可能完全不同的状态”。既然引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就增加了语言变化的复杂性，语音的演变既有传统所说的规律性，也会有随机性。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说明规则的变化和随机变化的规律和条件。最主要的一点在于以印欧语为根据的历史比较法作为基础，观察汉藏语言演化的过程，从而丰富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它具有更广泛的一般性。

作者并不介入汉藏语是否包括壮侗语、苗瑶语的争论，他讨论的对象主要是藏缅语。讨论中显示他对古藏文、古缅文、藏语支、羌语支、缅彝语支和景颇语支的方言都能充分掌握，几乎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正因为对这些语言和方言材料的了解，使他讨论元音演化、辅音演化和声

调演化的模型时能够从实际的语音变化入手，得出抽象的原则。

从第四章起就是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作者在讨论元音辅音演化之前，首先提出研究语言演化的多重视角问题。包括：一、语音之间的线性关系；二、语音空间及语音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三、语音自身的属性；四、语音所处的韵律地位；五、语言系统状态。从这些视角出发，自然他探讨的着重点和以往大有不同。例如：作者说的原理之一是“长元音在语音空间中上移”，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意涵：“一是元音变化之前发生过时长的变化、由短元音变为长元音。二是元音上移变化存在一定层次和过程。”这种推论背后的认定是多重视角的。作者讨论辅音和声调的演化都有同样的深度，这里不一一介绍。

综观此书，作者的知识面和注意的相关方向非常广泛，从考古、科技史、各语言的文化背景，以及印欧语言的演变史，到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拉波夫的语言变异理论和实验语音学的最新研究，他都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在年青的这一代语言学家里是一位少见的博学者。他得到的结论未必人人都同意，但都是从实际出发言之有物的。

如果要在本书中挑一点毛病的话，我觉得在某些讨论理论的地方不容易看懂，有些新创造的名词从字面上不容易了解其确切的意义。这也许代表年轻人爱好新奇的心态，假以时日炉火纯青的火候就会自然到达！

由于我和孙宏开先生合作的计划“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使我有缘结识江荻，江荻又有缘在清水湾科大做了一段时日的研究。我觉得他实事求是，好学深思，实在是青年学人的楷模。就以此序记此一段因缘。

丁邦新

谨序于香港清水湾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2002年9月9日

序言二

正像本书副标题对书名的诠释那样，这是一部主要以汉藏语系语言为研究对象、全面讨论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专著。

众所周知，20 世纪以来，汉藏语言的历史研究多次掀起学术论争的波澜，学术讨论的焦点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汉藏语言的系属分类问题方面，也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研究方法，基本目的就是要突破现有研究框架，转换视角去观察语系分类中难决的问题。

本书作者认为汉藏语言的历史和系属问题之所以很难探明和证实，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语言历史研究中没有建立一种把语言系统的演化与社会系统的演化关联起来的理论。这应该是事实，以往讨论语音演变的时候，尽管也有文章联系造成语音演变的社会、文化原因，可在单篇论文里这些讨论的深入程度是很有限的。本书的突出特点是从认识论和系统论的高度审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全面建立起语音演变与社会系统状态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反映出来的语音历史音变模型。试设想以往关于语音变化的观念，某个音素变为另一个音素，无非是去寻找关于音变的生理或者物理条件等方面的解释。而作者提出，不同的语音变化代表着不同的音变性质，蕴含着不同的社会系统状态属性。这样的见解是非常深刻并卓有眼界的，以我曾研究过的羌语来看，北部方言没有声调，南部方言有声调；北部方言复辅音复杂，数量较多，多半都对应着南部方言的单辅音形式；北部方言的长元音在南部方言中多半读成短元音和复元音。这些语音现象反映出来的特点就是南部方言发展比北部方言快。那么社会系统方面，北部方言群体与牧区藏族交错相邻居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呈缓慢发展状态；而南部方言群体从事农业生产，与周边汉族群体交往密切，社会各个方面都发展快一些。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系统状态恰好对

应着两种不同的方言差异，显然，我们很难否认不同的社会状态对语言是可能造成不同影响的。

第二个方面，作者认为语言是一种自组织演化系统，因而全面引入自然科学的非线性研究方法阐释语言的音变现象。虽然作者关于音变的研究基本限定在历史变化范围，但从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汉藏语言元音空间演化轨迹原理、元音长短特征属性原理、辅音强度等级原理、音势等级原理，以及响度等级原理、浊度等级原理和自主调控噪音机制原理等论述来看，作者的分析具有严密的逻辑基础，也符合当代语音科学的物理和生理分析方法和发展趋势。作者能够以现代科学演化理论为基础，对历史语音进行宏观探索，可以说的是深具洞见，达到了历史语音研究的全新境界。就以辅音音势等级弱化原理来说，作者提出：在气流强度和发音方法都确定的条件下，发音部位的差异仍然对语音的形成和变化产生影响。这是由于不同发音部位形成了不同的语音空间或不同的发音通道形状，发音通道的长短或空间大小会影响摩擦点的气流强度。越是处在通道外缘的音，比如双唇音，所需气流强度越大，越是处在通道内部的音，比如喉塞音，其形成所需的气流强度则十分微弱。因为通道面积越大，压强越小，二者呈反比关系。由于这个原因，作者认为，气流越弱，就越只能是靠近喉的部位构成阻碍。贯穿到各个音类，则可以获得音势强弱的基本顺序：唇音 > 舌尖音 > 舌面音 > 舌根音 > 声门音。把这个道理与社会群体的言语活动关联起来，越是封闭的社会群体，比如历史上家庭式的游牧群体，表达信息少、沟通频率低、词汇量萎缩，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语速缓慢、语气平缓、发音含混的效果，其结果就会出现一些音类的发音部位后移，也就是作者所说的音势等级弱化的现象。当然，这种分析是否符合各种不同语言事实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作者的分析独具特色，而他贯穿在全书中的这类分析可以说打通了语音与社会、语音与文化、语音与历史的关系。这是历史语言学家一直企盼能够做到的事情，我想这应该是本书对历史语言学的发展及重要贡献。

在微观分析上，作者的一些具体阐释也非常精辟。例如古藏语[*zl-*]声母为什么现代方言读作[*d*]或者[*dz*]，书中的讨论既生动又有趣（请参见作者1996、1997的论述及本书所用的图形表现方式）：前一个音素的气流段侵蚀了后一个音素的持阻时程段，两个音素的发音产生非线性叠置，

造成后一个音素[1]只剩下表现为破裂的除阻段，当然该音素就可能读作塞音或塞擦音了。后来潘悟云先生（1999）讨论汉语上古音时也接受了他的这个解释。作者进一步把这种音变现象与开放的社会系统联系起来，并以此反过来说明为什么藏语周边其他封闭型社会的语言中[ɬl-]大多脱落前置辅音而读作[1-]的原因。通读全文，我看到作者在每一项细微的分析中都能够联系社会系统与语言系统的关系来论述，真可谓是每一个为什么、每一个怎样变都能够有条有理地娓娓道来，其中不乏睿智与机趣。因此，系统状态纵横全书，构成一幅完美的立体网络框架，相当全面地表现了作者认识世界图景和语言演化的思想。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赞赏的观点，作者认为：“语言的演化是其随着社会演进、人类表达其认知世界的方式的变化以及所引致的语言符号体系的变化。”因此作者不同意把语言单纯看作交际工具，他指出：“语言是语言群体的社会行为，这样的行为反映他们怎样看事物，怎样看社会，怎样看关系，他们通过语言表达他们的看法，并形成了沟通和交流。所以，我们并不同意把语言定义为交际工具，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只是人们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种行为的结果而已。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表明语言具有沟通和交流的功能，除此之外，语言还具有一些其他重要的功能，特别是传播和传承功能。”我想，作者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深刻的认识，一是他阅读广泛，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二是他能够深入民族地区，通过接触社会各个阶层人民大众，观察语言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并最终形成这种观点。也正是因为作者具备敏锐的眼光，因此他看待语言和看待世界的视角是新颖的、有创见性的。

这本书还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创新，比如作者提出语音材料和语音组织方式演变的论述，这种跨越语系、语族，牵涉数千甚至上万年人类语音发展历史的宏观论述本来是难以让人想象的，可是一旦放在了作者构建的“语言系统演化论”框架之中，其与作者提出的语言观以及语言自组织机制原理融合得恰到好处，不能不让人信服。作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第三章第九节）还有一个扩展性讨论，即第四章第五节“音节的韵律特征”，而这个内容又与作者提出的语音演化五个视角相辅相成，这五个视角是：语音演化的线性关系、空间关系、自身属性、韵律地位以及环境关系或语言系统状态，作者的这些观点全都贯穿在他的具体研究中，由此可

见作者研究上的精细和周全，以及对宏观构思与微观分析的熟练驾驭能力。

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开创的辉煌历程使汉藏语言学在世界学术之林尽展风采，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在欢欣之余也必须看到今后道路的艰难。江获博士这部专论可以说是尽收历史比较法的精华，却又不受历史局限的羁绊，勇于深入剖析比较法的缺失，然后提出建立分析演变过程的理论以及历史音变模型的思想。作者坚持认为，通过对语言演化过程的研究，可以探索语言群体的社会发展历史，因为，决定语言演化的力量来自语言系统状态的变化并最终来自社会系统状态的发展，而这种状态是由语言群体所处时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总和所构成的。所以，语音的变化蕴含着系统状态属性，不同的音变类型反映了不同的音变性质和音变方向，从语音变化的性质可以一定程度上推断社会系统的状态，甚至体察到语言群体的历史面貌。反过来，如果我们凭借考古、历史、文化的研究而得以了解语言群体的历史状况，同样也可以用来判断语音的历史面貌和音变的过程及方向。这样的研究应该是今后历史语言学方面极有价值的努力方向。

作者在撰写博士论文之前已经发表过部分关于历史音变模型的论文，但由于一直没有机会全面阐述他的语言观和理论框架，非线性音变分析技术又与传统分析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读起来确实不易理解，因此，在当时的一些学界议论中以及论文的写作和答辩过程中，对他的一些分析，有人并不完全赞同。但我赞赏作者的理论勇气以及经过认真思考以后，建立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因为闪光的东西并不是一开始就会被普遍接受的。我特别要提到，作者对汉藏语元音各类移动演化的系统性详尽论述（第四章和第五章）在学界还是第一次；而对辅音音变现象的全面归类（第六章）也是以前所没有过的；至于作者在声调起源研究中把噪音特征与人的发音活动联系起来，提出自主与不自主调控型噪音机制理论，更充分体现了作者一以贯之的思想，即语音变化“要与语言主体的人的行为联系起来，人的发展过程既是生物性过程也是社会性过程。人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发掘和改善自身的潜能，达到控制、认识物质世界的目的，并且通过表达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来实现这个目的。因此，语音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表达方式的材料也同样会随着这个过程而不断变化”。可以说，作

者的这些研究都是独特的、创造性的，表现了作者获取真知的锐意进取精神和首创风格。

作者是位不畏艰辛的学者。不少人并不知道在历史语言学之外他近年来一直从事藏语计算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主持过社科院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这样的跨学科型学者现在还不多见，他的求知求新精神值得钦佩。

我和作者相交，从他 1985 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起已经有 17 个年头，我们又一起从 20 世纪走进了 21 世纪。我们之间虽然师生相称，但在相互切磋学问的过程中，实践了“教学相长”，我的收获不可谓不大。看到我们的后辈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气魄，我感到由衷的喜悦。但愿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在他们这一代研究人员的推动下，百尺竿头。更希望中国语言学在 21 世纪有更多无愧于时代要求的精品问世。

孙宏开

序于北京安贞里寓所

2002 年 8 月 28 日

前 言

汉藏语言学研究东亚大陆及东南亚区域的语言和语言的历史。迄今为止，对这一门科学，我们还不能准确描绘它的边界。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它所研究的对象究竟包含哪些语言，或者说，目前我们已经展开研究的语言中哪些语言并不从属于汉藏语系。至于研究对象内部的分门别类，也因为边界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因素，我们尚不能肯定哪些语言应该放在哪个层次，哪些语言应该排在哪个门类。这大概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学科窘态。

作为一门科学，19世纪和20世纪的汉藏语言学已经从其初创及蹒跚学步发展到驻足凝视、思考未来的阶段，站在了迈向成熟的边缘。在此期间，学科系统边界的变移、方法的取舍，以及理论的定向虽然一直都还处在晃晃悠悠的摆动之中，但其材料的积累却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汉藏语言学很大程度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尝试圈画边界的科学。而在理论上，它尚未从材料整理、具体思辨进展到宏观定性论述状态。这种理论式微的情况有其哲学根基，即传统解析式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原子论—还原论）总是把复杂现象分而又分，很少考虑它的整体性，结果局部异常清晰，整体却支离破碎。因此，在选择理论的时候，要用系统的概念来思考，包括既用精确分类的方法观察事物，又用普遍联系或者组织性的观念来理解。只有知道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正确理解事物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复杂现象。所以，能够把握每个事物的个性、各个个体差异中的共性，以及它们相互间联系的组织性，这样的理论才能站得住。

科学的理论就像眼镜，戴上合适的理论眼镜我们就可能看到全然不同的世界图景。不过，怎样选择眼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与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哲学观念相关。经验是什么？经验乃是我们累积关于客观世界

的感性知识，它也是形成我们哲学观念的基础。一般很难想象，世界独立于人的知识和经验之外。所以，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有可能从我们的经验出发，或者从经验汇聚和升华所成的哲学观念出发。于是，在汉藏语方面，也就很自然会产生类似朱德熙先生这样的感慨：“现代语言学的许多重要观点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事实为根据逐渐形成的。采用这种观点来分析汉语，总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这是因为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方面（最明显的是语法）有根本性的不同。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囿于成见，用独立的眼光去研究汉藏语系语言，就有可能对目前公认的一些语言学观念加以补充、修正甚至变革”（《序〈汉藏语概论〉》）。提到印欧语，我们又不能不想起王士元先生的一段话：词汇扩散理论“能对普通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把它的基础由目前对印欧系语言的偏向转到以整个人类的语言为中心的根基之上”（《词汇扩散理论：回顾和前瞻》，《中国语言学论丛》1996年第1期）。

以上两位先生的警示及导向，使我们强烈感觉到语言研究，特别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所浸淫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但是，如果弄一个什么中国中心论，或者其他别的中心论，未必就不失偏颇。因此，较好的策略则是既从印欧语言分析标准来评判汉藏语言研究，又从汉藏语言特性来剖析印欧语方法。先进印欧语，再回到汉藏语，也许，当我们把两方面都看过了，都实践过了，这副眼镜就能够找到。但如果认为语言系统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否认它们可以有共同的方法和理论，则有可能走到另一个危险地带。所以我们要考虑学术渊源。传承学术不是为沾上传统关系而标榜自身的渊源，因为传统观念极可能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深刻认识的一面。以历史比较法为例，它所揭示的是（部分）语言现象的普遍结构和演化的共性规则。无论哪种语言，都是人们表达其认识世界的行为方式，而语言演化则是人类表达其认知世界的方式的变化以及所引致的语言符号体系的变化。因此，比较法仍然是历史语言学可以依靠的有力工具。

另一个与理论眼镜有关的话题或许最好也在这里事先说一说。一般谈到门户之见时，往往理解成同门同业的派别之分。其实还有一种潜在的更令人沮丧的现象，那就是经常对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视而不见。惯常，我们说语言与声学、与生理、与生物、与心理、与数学、与逻辑、与文化、与社会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大概不算离谱。可是你如果说语言与基

因、与热力学，甚至与光学也有关系，大概就很难得到附和。其实这个“关系”可以看做是广义的，即承认语言与声学、与生理、与生物的关系无非因为语言包孕了声音现象，语言依靠生理构造而产生，语言能力是人类的内禀天赋，等等。然而，语言与数学，与逻辑，似乎只有相似的局部符号可计算、或者相似推理功能这类关系，以及纯粹方法上的关系。还有观点认为语言演化与生物进化具有平行性，这种类比实际上也是一种探索研究方法借用的关系。我们在这里真正要说的是，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它的发展都揭示客观世界的规律，揭示事物产生、发展和演化的共性。如果说语言也是客观事物，或者是更复杂的客观事物，那么，从其他学科产生的探索事物规律的理论和方法同样可以为语言学科所借鉴。认识事物的方法应该是语言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共有的财富，这就是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关系。本着这种精神，本书讨论历史语言学的时候，戴了一副“系统哲学”或者“系统自组织理论”的眼镜。这副眼镜灵不灵？从我们初步的具体实践来看，它基本是成功的，而它是否具有普适性，大概还有待读者来判断。

回到汉藏语言学问题上来。汉藏语言的历史研究，其目标是描述语言结构体系，探索语言及语族、语支演化的历史，构拟各层次原始母语，确定语系、语族、语支边界。不过，要完成这个目标，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都不能少。经过了这么多年，汉藏语言的材料累积了不少，新观点和新方法也层出不穷。但似乎不少的新方法只具有“补丁性”功能，强调对某些重要材料或者现象的解释力（不自觉就走了原子论的路子），而全面的、系统的理论方法还不多见。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对系统则一定要采用系统的方法研究。系统是什么？简单举例来说，当我们提到“祖父，父亲，舅舅”，这是看到了要素；换个方式提出“婆一媳，舅一甥”，这就看到了关系；再换个方式说“祖孙三代，一家五口”，这表现为结构；如果说“父亲，母亲，孩子，房子（家），工作”，这就是系统概念。系统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的元素构成的集合，并且与环境有明确的边界。系统的方法就是用整体的观念去认识和分析系统。当然，我们之所以能采用系统概念，正因为语言本身可以作为系统来建构和分析。汉藏历史语言学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有必要建立一套较为全面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充分利用理论的力量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或者文献非表音方式的缺陷。对于符号系统，还要提一提另一个令我长久叹息不已的现象。似乎多少年来，

人们逐渐制定了一个关于语言符号系统的游戏规则而不自觉，这个规则把语言符号真是当作“纯粹的”的符号，一种封闭系统的符号，就像中国象棋里的“车”、“马”、“炮”，跟它的质地竟然可以没有任何关系。语音符号是语言群体真实的声音形式，真实的物质实体，且不说长久社会状态对人的影响以及对他们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人们那瞬息变化的情绪也会在说话时的语音变化里反映出来。这些发生在符号底层的故事实际意味着语音物质形式的变化与说话人所处社会系统状态的关系。我们正是依据这样的认识来建立语言历史演化的理论。当然，任何理论都不是认识的终结，而只是使认识可能进行的手段。要彻底认识汉藏语及其历史，就需要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不断创新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奉献出这本小书，就是期望对清楚地认识汉藏语言及其历史这个宏大的目标作些微的贡献。

这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这次出版作了部分修订，有些论述独立为小节，章节的编排也作了一些调整，增加了一些未及编定的材料和论述。记得我做硕士研究生时，开始接触语言的历时现象，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为什么偏远地区的语言或者方言相对城市总是语音面貌古老，换句话说，我们感觉城市的语言发展快，乡村，特别是偏远乡村的语言发展慢，很保守。这个感觉应该说非常平常，但其中似乎蕴含着某种我当时尚不明白的道理。10年以后，当我接触到多种复杂的藏缅语言现象时，又重新面对这个问题。导师孙宏开先生鼓励我就此进行理论思考，不过问题并不简单，选择博士论文方向时，虽已发表有关见解，但朦胧的思路未成体系，还须获得关键性的洞见，于是有所迟疑和犹豫。现在论文完成了，其间的深层理论挖掘、哲学观念转换，特别是描述语言复杂性的同时也构建了自我思维的复杂性，这一努力的结果是，基本打通了语音演化与社会文化接面最平实而又微妙的关系，也最终释解了我久久萦怀心头的谜团。用简单的话说，汉藏语言之所以很难自足证明或充分解释它那久远而又复杂的历史，就在于我们没有建立一种把语言系统的演化与社会系统的演化关联起来的理论，没有把语言历史与使用语言的人民的历史以及他们的社会、文化关联起来。语言演化的原因、条件、方向、速度、参与演化的要素，以及语言系统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处的状态无一不与社会系统相关联。语言演化一定具有某种推动力，这种推力不是单一的、局部的或者偶然的。只有社会系统的发展，社会系统状态的变化才能持续不断地推动语言的变化。

至于社会推动力来自何处，显而易见，来自社会的发展，来自文化的升华，来自历史的进步。因此，社会系统状态变化才是语言演化的根本原因。当然，语言的演化一定要落实到语言的结构，特别是语音结构。语音符号作为系统，在外部环境（社会系统）的作用下，它的演化也是系统内部某种稳定的组织行为所使然。这种行为就是任何事物必然存在的演化规律。我们不能设想有某种外力，包括人自身在内，来担负这种组织职责。语言符号的演化有其自身的动力，这种动力来源于语言系统自己组织了自己的演化行为。为此，在以上关于语言演化的认识观基础上，在全书所贯穿的方法论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语言系统演化论的理论框架，而对这个理论体系的验证和操作则是本书中所提出的多项语音历史演化模型。

我们在书中已经指出，汉藏语系还只是不确定的假说，是不完善观察的结果。我们之所以仍然倚重这个不明确的假设，是因为我们认为历史语言学的目标不是单纯地建立语音对应关系、揭示语音演变规律和构拟原始母语，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历史研究可以揭示语言群体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历史、探索人类文明的进程、阐明人自身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发展。想想看，从语言来勾勒恢弘邈远的人类文明进程画卷，这难道不是一件富有挑战性、激动人心的事情吗？当我们看到语音不再是枯燥的符号变换，而是蕴含着鲜活的社会历史面貌、且其背后有数之不尽的故事的时候，欢愉的心情不就跟登上了眺望日出的山顶一样吗？

近年来，我一直忙于课题，疏于交往，错失了许多馈我新知的机会。但令我欣慰的是，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作访问学者时读到一本充满理论睿智而又结合汉藏语言历史的著作——《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何大安，1988），顿有众里寻他千百度之感，可见客观事实后面潜藏着的真知是可以在理论力量的驱使下达致殊途同归的。好在就本书的论点而言，观点上没有遗漏太多，只是多费了我许多时间幻觉于理论和方法的探究之中。读那本书，我分明看到了关于语言、关于语言的结构、关于语言和社会，以及更重要的从语言观察历史、观察文化是如何在那里展演开来的。我愿意引用作者何大安教授书中一段绝对精彩的论述：“我认为，语言是一种人文的表现。语言与其他人文现象，如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等，都不断经历着结构性的改变。对语言变迁的研究，因此不是狭义的语言学内的研究，而是和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关切牢不可分的。语言如同社